

劫后孤城，我们像汪洋中的扁舟

核心提示

现在回过头去看，5月12日上午，蒲方方的情绪有些反常，但当时是没有察觉的。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，气温骤降，许多人感冒了。那天刚刚放晴，万里无云。

按说天气晴朗，心情肯定也会舒畅，但蒲方方却有点不安，午睡按时起床的习惯被打破了。

下午要去县委礼堂参加青年创业表彰大会，蒲方方先上楼到办公室拿了笔记本。办公室所在的那栋小楼被人们称为“书记楼”，共三层，和县委礼堂之间仅仅隔着一个篮球场大的院子。

之后，他见证了北川县城在震后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，官员第一时间艰难自救的过程……



讲述人：蒲方方
性别：男
年龄：44岁
身份：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
采访地点：四川省安县

蒲方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震后的第一个晚上令人惊恐，也是他一生中很难熬的一夜。 刘毅 摄

■后记/记录者说

“站出来”，是因为“有种”！

与许多中年人一样，蒲方方喜欢看历史类书籍，每天手不释卷；与许多年轻人一样，蒲方方爱好上网，浏览新闻成为日常惯例；与许多老百姓一样，蒲方方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每日和家人通话。他是一个普通人。

然而，他也有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他是县委副书记。他坦言：“我当过武警，当过公安局长，凭我自己的野战生存能力，完全可以自己逃生。但那时，那么多的伤员，还有好多学生，任何有良知、有责任感的人都不会那样做。”

地震中，作为普通人的蒲方方经历了生与死的折磨，他也曾惊恐、害怕。然而，作为一个身担责任的人，他又多了一份镇定、勇敢。他说：“那时候，场面很乱，如果乱跑乱闯，还会死更多的人，群众需要主心骨，我必须站出来。”

“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会在地震中得到升华。”这是个性格内向的人，在讲述往事的时候轻声细语，但眼睛里却透露出坚定。

采访过程中，蒲方方的电话不断。危难关头站在汽车引擎盖上振臂一呼的他，眼下，正奔忙在建设新北川的路上。

■蒲方方口述史/北川县城

强震袭来，几百双眼睛都盯着我们，我们不能慌乱

这天下午，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打开电脑浏览新闻。下了楼，看了一下手表，才两点二十，突然想到应该给绵阳的妻子打个电话。妻子说正在商店买窗帘，我就安下心来。走到礼堂门前，和几位同事闲聊了几句话，便一起进入了礼堂。

在主席台下，我翻看了一下大会议程，我的任务是宣布表彰决定。我的右边坐着县长经大忠，我坐直身子，侧向他，想和他说话。这时，突然感觉到椅子摇了摇，是东西方向摇摆，幅度虽然不大，但是感觉明显。我第一直觉是地震，但认为可能是小震。

主席台下，人群出现了慌乱，有人准备往外跑。当时想，几百双眼睛都盯着我们，我们不能慌乱，否则台下观众可能往外挤，造成踩踏，所以就一动不动。我对经大忠说：“怎么在地震啊？”语气当时很严肃。“啊”字还没说完，就听见一阵“轰隆隆”的声音由远及近、由小到大传来，就像重型轧路机开过来的声音，像是从礼堂西边的王家岩传过来的。声音响起一两秒后，礼堂和地面就剧烈摇晃起来。

我摔倒在礼堂门口，几个人从我身上踩了过去

人们都意识到是强地震，拥向礼堂的两个大门。礼堂有前后两个大门，主席台离前门较近，但要下几个台阶，所以，当我左晃右摇地跑到前门时，礼堂内已经没有多少人了。

这时，门上方的墙砖和墙皮不停地垮塌，礼堂的天花板和灯具在“劈劈啪啪”地掉落，灰尘四起。我感到东西方向在猛烈摇摆，上下方向也在抖动，人站不稳。就在我准备跨出大门的时候，一块砖从头顶斜着砸下来，砸中我的头后又切中了左耳朵。我感到一阵眩晕，加上地在晃，我头朝下，倒在门口的台阶上。

倒在地上后，头已经麻木了，身体不能动，模模糊糊感觉一堆砖块和瓦砾重重砸到我身上，还有几个人从我身上踩了过去，但一点也感觉不到疼，想喊也喊不出来。在被砖块砸中之前，我的思维还是很清晰的，就是想到外边避一避。可是倒在地上那会儿，想向前爬，却爬不动。当时很无助，自己没有任何能力去抗拒。

我让武警组织大家往草坪上转移，当时脑袋也是晕晕乎乎的

当我趴在门口的时候，听到礼堂内部墙体塌下来的声音。后来知道，那是礼堂西边的王家岩山体下沉，拱翻了主席台后边的墙。过了一会儿，头脑稍微清醒了一点，我抬起头，看到“书记楼”边下沉地垮塌。印象中，好像四周都在垮塌，到处都是粉尘，1米之内也看不清人的面目，女人和小孩子们尖叫的声音此起彼伏……

我试着往前爬了两米，一位叫刘江的民警扶我起来。我感觉头上湿乎乎的，用手一擦，全是血，就顺手擦在衣服上。几分钟后，灰尘少了些，我看见3个穿羌族服装的小女孩在门口被砸住了腿，不停地哭喊。开会的时候有十多名武警也在参加，我看到县武警中队的副指导员贾大国，就让他马上组织救人，他们很快把3个小孩救了上来。

这时候，从礼堂里跑出来的人都挤在那个篮球场大的院子里。环顾四周，北边的“书记楼”已经垮塌，南边的礼堂部分垮塌，东边的一栋宿舍楼已经倾斜，西边王家岩的滑坡已经将山脚下的车库吞没。无论是王家岩滑坡的泥土涌下来，还是那栋宿舍楼倒下来，我们都无法活命。情况仍然十分危急。

视线越过那栋垮塌的“书记楼”，可以看到7层的县委大楼已经向东“趴”在地上，而大楼前那片草坪还没有被完全掩埋，是附近最宽敞的一块地方。我让武警组织大家往草坪上转移。这时，我的脑袋也是晕晕乎乎的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和大家一起来到草坪上。

人们惊恐万状，哭声四起，我登上汽车引擎盖组织群众转移

这时，县委大楼里不断有受伤的幸存者爬出，加上县委几栋尚未垮塌的宿舍楼跑出了一些人，都聚集在草坪上，至少有400多人。视线稍好了一些，抬头一望，县城所处的峡谷上空全是黑黄黑黄的烟尘。西边，王家岩仍在不断塌方，碎石和泥土发出吓人的“喇喇”声；东边，景家山上的大石头呼啸着砸下，发出“咚咚咚”的巨响。每一次响声，都让人心惊肉跳。

大家都很惊恐，我也一样。那会儿，感觉自己就像汪洋中的扁舟，完全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。许多人都被吓傻了。

两边的山要再这样垮下去，我们都要被“包饺子”。我是县委副书记，还当过武警，当过公安局长，我想，这个时候，我应该站出来。人们需要一个“主心骨”。

我喊道：“县级干部过来！”除了

我，在场的县级干部有李春寿、文刚、谢成旭、杜勇、王宽心、张映芳等，大家商量着怎么办。有人建议，原地不动，等待救援。有人说，虽然无法知道其他地方地震情况怎样，但北川县城在山坳里，最危险，还是要趁天黑前向外转移。最后，我拍板：全体人员向北川中学操场转移。

那时，我的头还很痛，就忍住，跳上一辆“风神蓝鸟”汽车的引擎盖，对着人群喊话：“共产党员站出来！干部站出来！身强力壮的都站出来！”

我喊道：“谁愿意去探路？”很多人举起了手，还有一位是女同志

我知道，左边，县委大院外的那条街道已经被废墟掩埋；右边，王家岩的山体还在垮塌。要走出去，第一个任务是探路。我喊道：“谁愿意去探路？”很多人举起了手，还有一位是女同志，她说她是北川中学教师，熟悉这条路。

后来，我派了一位叫母波的小伙子带路，将6个人分成两组，从左右两个方向探路。半个小时后，路，探出来了。

然后，按强弱搭配、大人和学生搭配、伤员和没受伤的人搭配的方式，对现场人员进行分组，5人一组撤离。为减少再次伤亡，我要求每5分钟放一组出去，这样，即便遇到山体滑坡和飞石，也不会伤亡过重。当时，也有个别青壮年想一个人跑，我们都安排武警和公安干警拦住了。

所幸的是，在转移过程中，这400多人没有再次受伤的。

余震三五分钟一次，碎石就像下雨一样，我们三人蹲在随时可能滑坡的山体上，度过了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夜



倒塌后的县委礼堂。 李宏 摄

从礼堂跑出来的时候，我的鞋子就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。当县委大院的人快撤完时，我才从院子里找了两只鞋子穿上，一只黑色的，一只棕色的，好在大小差不多，还真能凑合着穿。

等县委大院的400多人基本走完时，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。我们最后撤离的人员，准备从王家岩的山坡上向南绕行到任家坪。

走到山脚下，看到四五家农户的房子垮了。房子里的人已被砸死，当时在地里干活的家人幸免于难。他们有的正在从房子里往外掏东西，有的索性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我就带着县委办的两名工作人员上前劝说，“活着的人要保全下来，向安全的地方转移”。他们哭着说：“什么都没了，不想走了！”

劝说了一阵，有的农户终于同意离开，有的农户还是坚持留守。这时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看不清哪里在垮塌。如果继续爬山，随时可能会被塌方的山体掩埋。因为没有手电，我们最后同行的三人，只能靠手机的光亮，在王家岩半山腰找了一处地方，准备过夜。

那是令人惊恐的一夜，也是我一生中很难熬的一夜。余震平均三五分钟来一次。每次来时，先是听到由西向东的“轰隆隆”巨响，接着是一阵强烈的摇晃，然后是王家岩山体垮塌的声音，最后是对面景家山上的飞石落下，撞击到石头或建筑物的响声。巨石相撞，有时候还能看到冒出的火花。

不能哭出声，但泪水早已湿了眼眶。想到妻儿，我死了没关系，只要他们活着就好……

每一次余震结束，我们就等着下一次余震，好像在计算死神来临的脚

步一样。但心里都在希望下一次余震再弱一些，再弱一些。

同行的两个小伙子，家人都在县城，房屋都垮了。想到妻子、孩子可能已经死了，他们放声大哭。我是他们的领导，也是兄长，不能哭出声，但泪水早已湿了眼眶，只是夜色中谁也看不见。

组织人员转移时，我没想到到家人，等到静下来时，我一直在想：绵阳震得厉害不厉害？震中到底在哪里？妻子和儿子怎么样？那时，就想，我死了没关系，只要他们活着就好。

那一夜，月亮很大很亮。我们仨背靠着背坐着，谁也不说话，大家都想到了死的问题，以前怎能想到一条生命随时会戛然而止呢？

回望北川，懊丧万分，一件呕心沥血的作品，顷刻间被打碎了

5月13日早上，雨越下越大。我穿着一双两种颜色的鞋子，拄着一根树枝，爬过王家岩的滑坡地段。回头望，山体滑坡把老城区的一半房子埋在了泥土下，其他的房子也大多化为废墟；连接新、老城区的那条街道，已经被景家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掩埋；远处的茅坝新区，仅存的几栋楼也东倒西歪……这是我生活工作了6年的地方，现在已经面目全非。

6年来，我曾任县委常委兼县公安局局长、县委副书记，县城改造提升的每一个重大决策我都曾参与。2003年，北川成立羌族自治县，此后，对县城进行了羌族风貌改造。今年，又做了一项规划，要建设一个拦水堤坝，把岷江河的水拦起来，形成一个湖面，改善人居环境。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设计招标阶段。但这一切，都不存在了。

我没有为自己脱险而感到高兴，突然间，懊丧万分。一件呕心沥血制作的作品，刹那间被打碎了，最让人气短的是：找不到罪魁。

到达任家坪的北川中学后，我见到了四川省、绵阳市指挥救灾的领导，领导安排我到绵阳治疗。中午时分，我赶到市中心医院，医生诊断结果是：脑震荡，耳朵撕裂，缝了9针。下午，我见到了妻子张晴和儿子，一家三口抱在一起，大哭了一场。

石家庄日报社、绵阳日报社联合报道组 记者 刘毅 李永斌

您对《汶川记忆》系列报道有任何感想，请致电 88629200 邮箱 gnxwb@sina.com